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3.018

# 近30年来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述评(1988—2017年)

彭程<sup>1</sup>, 程书嘉<sup>2</sup>

(1.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神戸大学 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日本 神戸)

**摘要:** 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历史悠久, 近30年来亦未出现淡化或弱化的趋势。其研究视角比较客观, 去意识形态化倾向明显; 研究主体完成了“新老交替”过程, 一些旅日华人研究者开始崭露头角; 研究的开放性较强, 重视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 注重史料, 注重实证, 是其一以贯之的研究传统; 周恩来留日生涯、周恩来与西安事变、周恩来外交贡献是其三大研究热点; 少数右翼学者仍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碎片化倾向比较严重, 是其明显不足。

**关键词:** 日本; 周恩来研究; 去意识形态化; 实证研究; 留日生涯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3-0114-06

**引用格式:** 彭程, 程书嘉. 近三十年来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述评(1988—2017)[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3): 114-119.

##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Zhou Enlai in Japan in the Last 30 Years (1988—2017)

PENG Cheng<sup>1</sup>, CHENG Shujia<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Kobe University, Kobe, Japan)

**Abstract:** In Japan, the research on Zhou Enlai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o far it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n recent 30 years, with respect to this study, there has been no tendency of playing down or weakening in Japan, and the deideologization phenomenon is obvious in the research which can be carried out in a relatively objective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subject has realized the “supersession of the old by the new”.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 groups can 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many university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with profound Chinese research traditions. In the study of Zhou Enlai in Japan, Chinese researchers who travel to Japan come to the fore. The resear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the traditio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foreig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data remains strong. Besides, it focuses on empirical studies and is good at tracing historical details. There are mainly three research hotspots: Zhou Enlai’s study in Japan, Zhou Enlai and the Xi’an Incident, and Zhou Enlai’s diplomatic contribution based on Japan-China diplomacy. However, a few right-wing scholars are still unable to move beyond the shackles of ideology, and there is a serious trend of fragmentation in the research.

**Keywords:** Japan; the research on Zhou Enlai; deideologiz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career in Japan

收稿日期: 2018-12-0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日本馆藏涉常德会战档案的整理与研究”(XSP18YBZ077)

作者简介: 彭程(1978—), 男, 湖南怀化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关系史;

程书嘉(1987—), 男, 山西太原人, 神戸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关系史。

在周恩来研究中,国外的研究不容忽视。汪浩指出:“境外周恩来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大。原因是政治上比较开放,几乎没有什么顾忌。而境内有宣传领袖个人、突出领袖个人的限制,特别是周恩来这方面尤为严格。这不仅有中共方面的因素,也有周恩来自身的因素。”<sup>[1]</sup>事实上,国内学界在研究周恩来的过程中,借鉴和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的不多,除了政治上的疑虑之外,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不足亦是原因之一,具体表现为国外周恩来研究虽然得以蓬勃开展,但其研究成果却在国内往往受到忽视,这不利于周恩来研究的深入进行。<sup>[2]</sup>

迄今为止,国外周恩来研究的述评数量不多,仅有两篇。其一是《周恩来研究在日本》。该文发表于1996年,是第一篇国外周恩来研究综述。其将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西安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阶段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三阶段为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周恩来逝世,第四阶段为从周恩来逝世到1996年),并分别论述了各阶段的特点。<sup>[3]</sup>该文距今已有20余年了,已经不能反映最新的研究趋势和研究成果了,这不得不说是是一大遗憾。其二是《境外周恩来研究综述》。该文视野开阔,先后介绍了美国、日本、苏联、俄罗斯、中国港台地区的周恩来研究状况,但这同时也是其短处。文章在有限的篇幅内涉猎内容过多,所以论述有些笼统和抽象,文章仅仅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较为知名学者的研究作了“蜻蜓点水”式的介绍,对新锐研究者的成果鲜有触及。

在海外的周恩来研究中,日本一直是个重镇,其不仅研究历史悠久,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成果丰富。值此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为了推进周恩来研究的纵深发展,对近30年(1988—2017年)日本周恩来研究做一个回顾很有必要,但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一 研究现状

了解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必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日中关系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同时,全球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和日本国内政治走向也对其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近30年基本是冷战结束后的30年。虽然日本学界对毛泽东等中共

历史人物的研究呈现淡化和弱化的趋势<sup>[4]</sup>,但因为周恩来早年与日本的渊源较深,加之其对战后日本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并未呈现“淡化和弱化的趋势”。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其研究冷战前后并未产生像其他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那样较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点。

在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仅次于毛泽东研究。在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周恩来”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599件,文献形式有图书、论文、报刊等,其中近30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有20余件。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找出日本周恩来研究的一些新走向和新变化。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去意识形态化较为明显,研究立场较为客观。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学者对周恩来的研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壁垒,不像过去那样动辄将他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下,而是将他视为留日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1949年前)、新中国的领导者(尤其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负责人)。过去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而最近30年来仅仅只有一篇文章做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要的研究热点是周恩来的留日生涯、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以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核心的周恩来外交贡献,这三个方面是近30年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的主要选题。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热点都是以“日本”为主线来展开的,日本学界把周恩来研究从“世界史”(中国史)的范畴逐步纳入到“日本史”(日中关系史)的范畴。

其次,从研究性质来看,属于民间研究和学术研究。直至逝世,周恩来长期负责包括对日的外交工作,因此过去包括外务省、防卫厅等政府机构对周恩来都有不少的研究,这当然主要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属于政治研究的范畴。随着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官方研究基本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学、民间研究机构为主的学术研究。最近30年则完全将周恩来视为历史人物来展开研究。

第三,从研究主体来看,完成了“新老交替”过程。过去日本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日本战败前培养的“中国通”，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尤为明显，这部分人处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因为年龄的原因这些“老朋友”和“中国通”从中心逐步走向边缘；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批“老人”凋零殆尽，一批年富力强、接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学者担纲主角，成为目前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的主力。

在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中，传统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影响不容忽视。194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所和1951年成立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周恩来研究不可小觑，而一些过去具有深厚中国研究传统的大学，比如早稻田大学、樱美林大学、大东文化大学、中央大学、立命馆大学、杏林大学等，研究成果较多。大东文化大学的冈崎邦彦、神奈川县立外语短期大学的新谷雅树、立命馆大学的松本英纪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刊物是周恩来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平台，如大东文化大学的《东洋研究》刊登了3篇相关研究论文，《大东法政论集》也刊登了1篇，合计4篇。杏林大学的《研究年报》和《杏林大学研究报告·教养部门》各刊登了1篇。

旅日华人研究者在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中也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最为知名的旅日华人学者是张志强。他持续关注周恩来的留日生涯，发表了系列论文。他与新谷雅树合著的《日本留学期间的周恩来》一文在相关刊物分四期连载，是周恩来生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成果。此外，中央大学的王宗瑜、早稻田大学的胡鸣、横滨市立大学的宋尧等，在周恩来研究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旅日华人学者，熟谙中日两国的国情，非常了解彼此的学术话语特点，能熟练查找并利用两国的文献，其在研究视角、选题上与中日两国的本土学者都有所差异，显示出研究的独特性。不过，由于出身背景、生存压力等原因，他们还无法左右日本周恩来研究的话语权。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比较开放，重视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外，尤其是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地区较为重要的研究论著大部分被译为日语，在日本出版发行，其主要著作有《周恩来——不倒翁波瀾の生涯》《長兄——周恩来の生涯》《毛沢東、周恩来と溥儀》

《周恩来伝：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鄧穎超と池田大作》《周恩来、池田大作と中日友好》等。<sup>[5-10]</sup>此外，日本的图书馆还藏有大量未经翻译的国外周恩来研究的原文论著。在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检索系统以“周恩来”为关键词来检索的话，外文（尤其是中文，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的原版图书、报刊、学术期刊等占了一半以上。这不仅反映出日本学者宽广的研究视野，而且反映出其良好的外语水平。

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重视史料、重视实证研究、擅长追踪历史细节的传统也一以贯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集》，收集了中共党史资料1103篇，其中有关周恩来的多达数十篇。有些文献价值很高，如周恩来为中共六大起草的《组织问题提纲》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国外保存的六大文件集有两种：一种是1928年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是1929年上海出版的。“上海版”中收有周恩来写的《组织问题提纲》；莫斯科版中没有收入，但在该书中收录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中提到了周恩来的提纲。日本学者在研究了这两个版本后认为：《组织问题提纲》是周恩来为六大起草的一个文件，但是后来被共产国际否决，没有被列为大会正式决议案。六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瓦西里也夫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他们还引用了1929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一个通知作为旁证，澄清了周恩来生平传记中的一个重要问题。<sup>[11]</sup>此外，松本英纪的《一篇祭文——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张冲及潘汉年》（一）<sup>[11]</sup>、《一篇祭文——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张冲及潘汉年》（二）<sup>[12]</sup>的注释达130余条，广泛引用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各类资料。李恩民《从外交文书来看周恩来的对日和乎外交——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构想为中心》一文引用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公文达十余种，研究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sup>[13]</sup>

## 二 三大热点研究

如上所述，近30年日本周恩来研究的热点有三个，即周恩来的留日生涯、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以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核心的周恩来外交贡献。以下选取其代表作，分门别类进行介绍。



### (一) 周恩来的留日生涯

日本学者的研究以注重细节见长,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水平很高。

原东京学艺大学校长鹭山恭彦的《周恩来的日本留学与东亚学校校长松本龟次郎》一文,立足于中日友好,描述了周恩来在日期间与亦师亦友的松本龟次郎,以及其他日本友人元木省吾、吉野造作的交往,重点介绍了松本龟次郎的生平与对华友好思想。<sup>[14]</sup>

张志强的《归国还是继续留学——以周恩来留日中的纠葛为中心》一文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当时令周恩来左右为难的一件事,即1918年5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日留学生发起了通过回国来抵制该协定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周恩来当时对此项运动的认识及采取的行动成为文章关注的重心。该文将周恩来还原为一个20岁的弱冠学子,最后得出结论:“过去的研究认为周恩来天生就对政治敏感,总是一副身先士卒的斗士形象,但他也有彷徨和犹豫的时候。当然,周恩来充分怀有爱国热情和使命感这毋庸置疑。但此时他的思想尚未成熟,又没有找到指导自己行动的主义和信条,因此遭遇国难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但他一定对自己的无力感十分痛心疾首。”<sup>[15]</sup>

张志强的另一篇文章《中学时代周恩来的思想特征》,将周恩来的南开中学经历视为其赴日留学的准备时期,以周恩来中学时代的作文为中心论述了此时周恩来的思想和政治意识,指出:“中学时代的周恩来认为,中国人道德和知识水平很低是造成中国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是最优先的课题……这种观点主要源于周恩来少年时代的遭遇,以及恩师张伯苓实施的道德教育。”<sup>[16]</sup>

此外,他和新谷雅树合著的《日本留学期间的周恩来》一文长达近130页,分为4期连载,可谓日本“周恩来留日生涯”研究的集大成者。其第一部分重点考察了周恩来赴日留学的动机和背景,第二部分论述了周恩来日本留学的前半期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了周恩来日本留学的后半期情况,第四部分分析了周恩来在日期间思想上的变化。该文认为周恩来来到日本留学,虽然最后因为没有考取理想的学校而不得不回国,但至少

有三个方面的收获:其一是在学问上,他完成了从文言体向白话体、口语体的转变,为将来写出感染力强的各类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是在性格上,他因为在日期间生活拮据、交友不多,加之考试结果不如意,磨练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性格,这对将来从事外交工作很有裨益;第三是在思想上,在当时留日中国学生还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他已经阅读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开始对十月革命表现出关心并产生了共鸣,完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找到了将来发展的道路。<sup>[17]</sup>

### (二)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转折点,日本学者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立命馆大学松本英纪的《一篇祭文——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张冲及潘汉年》(一)(二)两篇文章对此作了角度新颖的论述。文章从周恩来所作的一篇祭文《悼张淮南先生》入手,刻画了国内被忽视的“小人物”张冲的形象,层层推进,抽丝剥茧,考证了周恩来与张冲的认识时间,很好地还原了周恩来、张冲和潘汉年的关系,以及三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论证严密,以小见大,堪称典型的“日本式研究”。该文认为周恩来和张冲的首次会面是1936年5月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但周恩来自己却表示是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才结识张冲的。松本英纪认为,周恩来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不暴露党的政策、党的行动。因为对周恩来来说,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不能公开承认与国民党情报人员有过接触。张冲和周恩来早年是隐蔽战线上的对手,所谓的“伍豪脱党启事”就是张冲所为,但西安事变后两人又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因为两人都怀有一切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信念。<sup>[12]104-105</sup>

冈崎邦彦的《西安事变与周恩来》亦是一篇佳作,文章开门见山指出:“在西安事变中与张学良一起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和国民政府军避免了内战,而且为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蒋介石约定展开国共合作谈判,留下这一历史性贡献的就是周恩来。”<sup>[18]</sup>文章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是1936年中共、周恩来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宣传和怀柔工作;二是中共从

“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三是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西安工作——作为“谋主”的周恩来。

### (三)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核心的周恩来外交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贡献。而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我国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成绩，而且“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理念也让两国人民受惠无穷，日本学者对以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核心的周恩来外交贡献论述颇多。

宋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周恩来的作用》一文首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不管从哪种观点来看，在日中建交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了，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只停留在其‘政治决断’上，为何周恩来能发挥重大作用？他是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作为个人的周恩来和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在日中关系的舞台上分别扮演了何种角色？”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作者最后指出：“周恩来高超的外交手法或者说是外交战术，是从拥有悠久历史国家的‘政治智慧’中产生的，不仅如此，周恩来的外交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锤炼出的统一战线战术的产物。建国后，周恩来在对待包括日本在内的对外关系的各项原则，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中统一战线理论的国际版。”<sup>[19]</sup>

杉浦康之的《“知日派”周恩来的实像——从建国初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中国的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一文开门见山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指导者中，对日本人来说最为熟悉，也最有好感的应该就是周恩来了。”他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一是从建国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中国的对日政策都是在对美战略这一大的框架之下展开的；二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周恩来是唯一拥有留日经历，具有一定的日语水平者；三是在与周恩来关系紧密廖承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内的‘知日派’能聚集起来，作为对日工作的实践者展开活动。”<sup>[20]</sup>

胡鸣的《周恩来的对日外交与田中访华——

以〈竹内笔记〉为中心》一文则聚焦于1972年7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内义胜访华这一历史事件，作者认为竹内先后三次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会谈的记录——《竹内笔记》在促使田中首相尽早访华、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竹内不仅不是田中首相的特使，‘日本基辛格’这一称号也言过其实。竹内被周恩来选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桥梁，反过来成为周恩来的‘密使’，发挥了重大作用。”<sup>[21]</sup>

冈崎邦彦的《建国后半世纪的中国外交（上）——从中国外交资料来看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外交政策》一文，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中国外交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外交政策是以取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实现安全保障为目的；二是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期的外交政策是‘反美反苏’；三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的外交是‘联美抗苏’。”<sup>[22]</sup>他的另一篇文章则主要论述了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4年经济调整期间周恩来的对日工作和对日政策从强硬到柔软的变化过程，并最后得出结论：“一是最初周恩来对日本怀有既警惕又期待的复杂心情，一方面认为岸信介内阁实施‘两个中国’的阴谋，但一方面为了国内建设又希望与日本展开钢铁贸易；二是中苏决裂后，为了打破国际上的孤立和封锁，实施新型对外策略，期待扩大与日本的贸易和交流；三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周恩来认为在调整经济过程中需要日本的协助，应当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贸易。”<sup>[23]</sup>

在看到日本学界周恩来研究取得不小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其存在一些明显不足。

其一，虽然整体上去意识形态化较为明显，但仍有少数右翼学者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强调所谓的“政治性”，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周恩来。高畑常信的《周恩来的处事与人生》一文就是其中的典型。该文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出发，歪曲了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关系，充满了阴谋论的色彩。<sup>[24]</sup>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sup>[25]</sup>也被翻译成日文，在右翼学者中有一定的市场。所幸的是，日本从来不缺乏公正、严谨的学者，右翼学者在日本学界处于较为边缘的

状态, 其研究成果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其二, 研究力量较为分散, 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较为严重。近30年, 只有1989年日本新闻界以编辑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中的周恩来》为契机, 成立了“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 创立了“周恩来研究基金”, 此外并无出现以“周恩来”为专题的集中研究项目。日本的周恩来研究主要还是以个体研究为主, 虽然研究成果个性比较鲜明, 但很难产生较为集中、系统的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 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在从事周恩来研究时, 我们要对此予以扬弃。预计今后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将围绕着“周恩来与日本”的这一主题, 按照目前的强度和频度, 多角度、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 参考文献:

- [1] 汪浩. 境外周恩来研究综述[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577.
- [2] 汪兵. “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2(2): 49.
- [3] 陈立旭. 周恩来研究在日本[J]. 日本学刊, 1996(4): 140-151.
- [4] 郑萍.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述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12): 128.
- [5] WILSON D. 周恩来: 不倒翁波瀾の生涯[M]. 田中恭子, 立花丈平, 译. 东京: 时事通信社, 1991.
- [6] SUYIN H. 長兄: 周恩来の生涯[M]. 川口洋, 川口美树子, 译. 东京: 新潮社, 1996.
- [7] 王庆祥. 毛沢東、周恩来と溥儀[M]. 松田彻, 译. 东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8] 金冲及. 周恩来伝: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M]. 刘俊南, 谭佐强, 译. 东京: 岩波书店, 2013.
- [9] 孔繁丰, 纪亚光. 周恩来・鄧穎超と池田大作[M]. 高桥强, 译. 东京: 第三文明社, 2012.
- [10] 孔繁丰, 纪亚光. 周恩来、池田大作と中日友好[M].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 译. 东京: 白帝社, 2006.
- [11] 松本英纪. ある追悼文: 西安事変前後の周恩来、張沖そして潘漢年(一)[J]. 立命館東洋史学, 2007(30).
- [12] 松本英纪. ある追悼文: 西安事変前後の周恩来、張沖そして潘漢年(二)[J]. 立命館東洋史学, 2010(33).
- [13] 李恩民. 外交文書に見る周恩来の対日平和外交戦略: 《日中平和友好条約》の構想を中心に[J]. 桜美林大学産業研究所年報, 2005(23): 237-255.
- [14] 鷺山恭彦. 周恩来の日本留学と東亜学校校長の松本亀次郎[J]. 亚洲文化, 2015(12): 12-25.
- [15] 张志强. 帰国するか、留学を続けるか: 日本留学中の周恩来の葛藤を中心に[J]. 杏林大学研究報告・教養学部, 1989(3): 98.
- [16] 张志强. 中学時代の周恩来の思想的特徴[J]. 研究年報, 2001(3): 201.
- [17] 新谷雅树, 张志强. 日本留学中の周恩来(四)[J]. 神奈川県立外語短期大学紀要・総合編, 2001(3): 54-56.
- [18] 岡崎邦彦. 西安事変と周恩来(上)[J]. 東洋研究, 2015(7): 69-70.
- [19] 宋尧. 日中国交回復における周恩来の役割[J]. 国際文化研究紀要, 2008(3): 188.
- [20] 杉浦康之. 『知日派』周恩来の実像: 建国初期から日中国交正常化までの中国の対日政策と対日工作[J]. 鵬友, 2014(5): 6-7.
- [21] 胡鸣. 周恩来の対日外交と田中訪中: <竹内メモ>をめぐって[J]. アジア太平洋研究論集, 2008(9): 94-95.
- [22] 岡崎邦彦. 研究半世紀の中国外交(上): 毛沢東・周恩来時代の外交政策[J]. 東洋研究, 2002(3): 72.
- [23] 岡崎邦彦. 中国の対日政策決定における動揺: 大躍進から経済調整への転換期における周恩来の対日工作[J]. 東洋研究, 1999(11): 61-62.
- [24] 高畑常信. 周恩来の処世と人生[J]. 徳島文理大学文学論叢, 2010(3): 21-47.
- [25] 高文谦. 周恩来秘録: 党機密文書は語る[M]. 上村幸治, 译. 东京: 春秋文庫, 2010.

责任编辑: 黄声波